

· 孟繁华文集 ·

众神狂欢

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化现象

E N G F A N H U A W E N J I

繁华



人民文学出版社

· 孟繁华文集 ·

众神狂欢

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化现象



E N G F A N H U A W E N J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众神狂欢: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化现象/孟繁华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孟繁华文集)

ISBN 978-7-02-012457-2

I. ①众… II. ①孟… III. ①文化研究—中国—现代 IV. ①G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38842 号

责任编辑 付如初

装帧设计 李思安

责任印制 王景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玺诚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61 千字

开 本 890 毫米×1290 毫米 1/32

印 张 9.875 插页 3

版 次 2018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2457-2

定 价 3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自序

1978年初中毕业十年后,我考取了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东北师大历史系非常著名,尤其是世界上古史研究,享誉海内外。入学后,给我们78级上课的,恰恰是世界上古史的权威专家林志纯先生。林先生是福建人,一口浓重口音的福州普通话。出生于1910年的林先生,1978年已经68岁了。他个头不高,但非常挺拔。上课时他没有讲义没有教案,手里举着一支粉笔便走向讲台。林先生讲的是亚述学。作为一个初中都没有毕业的学生,听一个顶级专家用福建普通话讲从未听说过的学问,其情形可想而知。

我觉得自己难以完成学业,于是便有了强烈的转到中文系学习的想法。那时的大学不允许随便转系,我也经历了非常曲折的转系过程。最终还是如愿转到了中文系。我这样叙述从历史系转到中文系的过程,说到底还不是遇到林先生而“知难而退”——78级历史系的同学除了我都学得很好,而且有许多人在历史学领域取得了杰出成就。现在想来也真是对不起林老先生了。

说到底,转系还是个人兴趣使然。一个初中生大概也只能对文学感兴趣——因为可供选择的兴趣实在太有限了。那时东北师大的中文系也是名系。著名学者杨公骥、蒋锡金、孙晓野、何善周、孙中田等都在那里任教。1982年从东北师大中文系毕业后,我分配到了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中文系任教,从那时起就成了当代文学的专业教师。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和普通院校差别很大,教师基本是组织教学,聘请国内各学科造诣较高的学者做主讲教师,本校教师做的应该是

教辅一类的工作。但这个工作有很大的好处，就是可以直接接触本学科最好的老师。谢冕教授、洪子诚教授、刘锡庆教授等，就是我在电大组织课程时开始接触的。在组织“当代作家谈创作”课程时，也就是1983—1984年期间，我也有机会先后见到了晓雪、流沙河、周克芹、刘宾雁、刘绍棠、李国文、张弦、李准、叶文玲、汤吉夫、路遥、雷抒雁、张抗抗等著名作家，这些当然使我对当代文学有了另外一种有趣和更加直观的感受。

1989年，我到北京大学做访问学者两年，然后考取了北京大学中文系谢冕先生的博士研究生。谢先生以“批评家周末”的沙龙形式教学，既是上课也是讨论。洪子诚老师以及陈晓明、王宁、韩毓海、旷新年等学者，都参加过这个沙龙。这个沙龙坚持了十年，在圈子里有很大的影响。谢先生被称为北大民主的象征，科学的象征是严家炎先生。谢先生民主、宽容，但做起事来极为认真。他除了组织学生上课讨论之外，还先后组织出版了大型丛书或书系多种，有的大型书系我以“跑龙套”的身份参与了部分组织工作。这些经历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到北大学习，使我对包括当代文学在内的学术工作有了完全不同的认识。客观地说，我的学术生涯是从进入北大开始的，或者说，是老师谢冕先生改变了我的人生。

北大博士研究生毕业，我分配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研究室工作。后来到当代文学研究室工作并担任了研究室主任、博士研究生导师。社科院文学所是国家最高文学研究机构，研究条件、学术气氛和研究水准在国内都堪称一流。我的主要学术著作和文章，大都是在文学所完成的。至今我仍然非常怀念那个时代的文学研究所。

张炯、樊骏、杜书瀛、陈骏涛、董乃斌、赵园等学术前辈，既是各研究领域著名的学者，同时也是从事学术工作的榜样；汪晖、陈晓明、蒋寅、许明、吕微、李洁非、陈福民、靳大成、彭亚非等同事风华正茂，他们的学术热情和学术抱负，都曾深刻地影响着我。

后来，我受聘于沈阳师范大学，任特聘教授、中国文化与文学研

研究所所长,工作至今。沈阳师范大学不是名校,但它是一所充满朝气、给人以希望和鼓舞的大学。学校给我的学术空间和特别支持,我深怀感激。

当代文学研究,一直是一个备受议论的学科,甚至是一个只可意会的、受到“歧视”的学科。任何人都可以对当代文学说三道四,只因为它“没有学问”。但是,事情远非如此。是否“有学问”不在于研究对象,而在于对研究对象的见识和见解。不是说研究与历史有关的、越是古老的学科就越有学问,研究当下的就没有学问。事实上,研究与历史有关的学科,也一定要与当下建立联系。这就是克罗齐说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当代的理论、问题、知识等,都潜移默化地融进了对历史的阐释和处理之中;同样的道理,如果没有“上游”学科的知识、没有西方的理论和创作知识,想做好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和批评,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不屑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和批评的人,显然有偏见,是一种对中国当代文学学科缺乏了解的表现。我这样说,并不是强调研究当代文学比研究其他学科更重要,而是说,客观地看待一个学科和它的研究者,可以使我们少犯或者不犯常识性的无聊错误。

我从事当代文学研究和批评三十多年,陆续发表了几百万字的文字。文集是从这些文字中编选出来的。我知道,纸质媒体虽然是全媒体的一部分,但它的弱势地位和边缘化趋势已无可避免。纸质媒体加上文学批评这个行当,二者合在一起,其命运不难想象。当然我也知道,学术活动在任何时代都不可能大红大紫,那也不是学者工作的目标。我们不必神圣化文学批评的重要性,同时也不必妄自菲薄。世事沉浮万物消长,在一切未果的时候,我们不妨将眼光稍稍放远一点,历史自会显示出事物应有的价值。

以上是我从事当代文学研究、教学和批评工作的简单履历,无甚新意。

非常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能够接受出版这套文集。尤其感谢责任编辑付如初博士,她的认真负责让我非常感动。她的工作避免了

文集中的一些问题。感谢我的父母、家人,感谢我的老师、学生和朋友们。正是因为他们,红尘滚滚的人间才如此可爱,枯燥的学术活动才值得用一生去追求和从事。

2016年9月22日于北京寓所

目 录

绪论 精神裂变与众神狂欢	1
第一章 日渐模糊的文化地图	17
一、主调明丽的昨日世界	19
二、文化碰撞时代的来临	27
三、文化重构与文化新语境	41
第二章 国家意志与主流文化资源	56
一、红色经典与世俗化旋风	58
二、当代英雄神话	66
第三章 今日时尚及领导者	77
一、从理论评介到话语实践	78
二、幻觉文化的允诺	87
三、白领趣味的流行	101
四、90 年代的青春梦	113
第四章 小写的文化:大众文化的两种时间	127
一、大众文化的娱性功能	127
二、大众文化的两种时间	130
三、“伤寒玛丽”与“文化带菌者”	136
第五章 天鹅绝唱与东方乌托邦	146
一、文化挫折与失望情绪	148
二、历史幻灭感及其叙事	153
三、“闲适潮”的兴起	162
四、批评的流失与创作的浮华	168

五、乌托邦的东方挽留	175
六、人文精神大讨论	180
七、旧理想主义与新理想主义	187
第六章 传媒战争与传媒功能的转变	198
一、报刊体制改革与改刊风潮	198
二、传媒大战与功能的转变	203
第七章 “千座高原”上的虚拟世界	211
一、游牧文化与网络意识形态	214
二、网络文学	222
第八章 新阶层的形成与话语空间的扩张	229
一、社会分化与新阶层的形成	229
二、中产阶级话语空间的建立与扩张	235
第九章 资本神话时代的无产者写作	244
一、无产阶级文学终结之后及其命运	245
二、无产者写作群体的出现	248
三、“超文体”写作中的理想情怀	253
第十章 全球化/亚洲青年的反抗与狂欢	257
一、文化霸权:话语与实践	257
二、文化实践:亚洲青年的反抗与狂欢	260
附录一 知识分子的“背叛”“出走”与“死亡”	
——21 世纪初长篇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	265
一、知识分子的“背叛”	266
二、知识分子的“出走”	271
三、知识分子的“死亡”	275
附录二 总体性的幽灵与被“复兴”的传统	
——当下小说创作中的文化记忆与中国经验	279
一、神秘事物与民间文化	280
二、小说修辞与文人趣味	288
三、超稳定的乡村世风与伦理	293

第一版后记 301

修订版后记 303

人大版后记 306

绪论 精神裂变与众神狂欢

关键词:世纪之梦 市场 经济文化 冲突

现代性的追求作为世纪之梦,在历史的隧道中已经回响了百年,因此也成为百年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基本母题,作为民族求新求变的话语表达形式,它一直延续至今不衰。百年中国就是不断寻求变革图新的中国,除了实践层面的多种努力外,悬浮于现实之上的思想文化冲突,构成了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的独特景观。然而,我们发现,同样是思想文化的冲突,由于历史处境的不同,它的内涵和表达形式也不尽相同。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由于历史的渐进性发展,为话语权力的拥有者们留下了相对从容的思考机会,这使得他们心态自信,并且姿态优雅。因此,中学与西学、文言与白话、传统与现代、激进与保守等思想文化冲突才不绝于耳。那时,言说者们大多以民族精英自居,都自信民族之梦将在他们的文化策略中得以实现,这种心态和话语方式一直延续至80年代中期。

1985年,在新一轮“中国文化热”和“中西比较风”的热潮中,甘阳写下了一篇《八十年代文化讨论的几个问题》一文。文章认为,80年代文化讨论的根本任务,是要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文化讨论的根本问题并不在于中西文化差异有多大,而是在于中国文化必须挣脱旧的形态而走向“现代文化形态”。同时他认为,当前文化论争的核心理论问题是传统问题,传统并不等于“过去已经存在的东西”,而是永远向“未来”敞开着的无穷“可能世界”,而弘扬光大传统

的最强劲手段恰恰是反传统。这是因为“中国人的传统意识、传统心理、传统知识形态、传统行为方式,与现代化社会必然要求中国人的现代意识、现代心理、现代知识形态、现代行为方式之间的全方位遭遇和总体性冲突”^①,这种宏阔的“现代文化形态”虽然语焉不详,但字里行间让人感到作者勃发的激情和历史主体意识。与此交相辉映的是这本刊物的“开卷语”,它开篇就指出:“中国要走向世界,理所当然地要使中国文化也走向世界;中国要实现现代化,理所当然地必须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这是80年代每一有识之士的共同信念,这是当代中国伟大历史腾飞的逻辑必然。”它的用语都是“理所当然”“必然”,这不容置疑的自信,分明让我们感到“五四”时代“少年中国”英姿的翩然复归。同时,它还以想象的、诗性的浪漫憧憬着“创造出当代中国文化的崭新形态”,并“满怀信心地眺望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交融会合的远景”^②。这气势和想象不能说不具有无比的魅力和强烈的感染力。那一时代,无论是学者还是作家,大都持有这样的心态和姿态。它是时代最具鼓荡力的声音,它表达了对启蒙对象的渴望和想象,而它的声调,也相当吻合在革命的鼓角战歌中哺育成长起来的民众的习惯和口味。因此,将这种声音称为“精英的启蒙之音”是恰如其分的。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这竟是百年中国最后的启蒙之音。在世纪之交尚未莅临的时候,启蒙主义和一代精英在历史的舞台上还来不及谢幕便提前退场。值得我们思考的是,他们所预言的一切并未如期而至,历史却以另外一种方式呼啸而过。20世纪90年代,知识分子的心态和心境已判然有别,那宏大的宣言和慷慨允诺已恍如隔世。1991年,第一份具有民间色彩的、有影响的学术刊物《学人》在北京创刊。主编陈平原在“后记”中说“几年来,孜孜以求,不想惊世骇俗,但愿能‘理得’而‘心安’”:

凭我们对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理解,“学在民间”是政治动荡和社会转型期维持纲纪人伦和价值的重要支柱。与其临渊羡鱼或痛骂鱼不上钩,不如退而结网。文化决策者的价值取向

是否值得欣赏是一回事,知识者自身的选择和努力又是一回事。借助于民间的力量,寻求学者经济上和思想上的独立,而不再只是抱怨政府对学术支持不力,这是近几年来我们共同的思路。^③

即便是已经后退几十里下寨的言论,也是事隔一年半之后才公开发表,作者心存忧虑的是“担心危及生存”,刊物的“后记”成了名副其实的“后记”。后来,在《文学史》第1辑的编刊后记中,作者又强调,他们“追求持重厚实的学术品格,没有惊世骇俗的高论,大都是平正通达的研究,言必有据,据必可稽。强调引文注释的规范化。无非是想提倡一种老老实实读书、认认真真作文的学术风气;但愿能免‘不贤识小’之讥”^④。知识分子一反“舍我其谁”的强烈的人世情怀,而返身退回了书斋。用陈思和的话说,就是从“广场”退回了“岗位”。

不仅学院派的知识分子如此,关注现实的知识分子也同样感到了自己身份正被取代的困扰:“传统知识分子以理性方式影响社会的情景,正由商业性的明星、歌星、影星、体育明星和政治活动家取代。由于人们对理性、真理、正义、价值、尊严感这些近代以来知识分子赖以存在的条件和基础的兴趣消逝,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正在被取代。知识分子存在的大本营——大学也不再是文化的基地,不再是思想性生活的园地,也受制于‘消费性’社会和市场社会的一般原则:实用性,直接性,短期性。大学成为培训班,成为社会生产专用人才(商品)的工场。传统意义上‘传道、授业、解惑’式的教育已经死亡,传统的名著和价值观念无人顾及和关注。”^⑤与80年代相比,知识分子的心态和姿态再也没有优越可言,这就是历史发展渐进与断裂造成的不同的精神状态和话语方式。进入90年代之后,知识分子的自我期待已降到了百年来的最低点,历史断裂造成的精神裂变使这一群体猝不及防。知识分子是现代性的最初呼唤者,是向着这一方向变革的热情支持者,它不仅体现知识分子对社会进步的历史意识,同时也符合他们向往革命的内心需求。革命令人迷恋而沉醉,然而“真正的问题都出现在‘革命的第二天’。那时,世俗世界将重新

侵犯人的意识”^⑥。80年代呼喊的“反传统”文化策略,在90年代已自行瓦解,“传统”在世俗化的大潮中已无法构成对峙性的力量,人们迅速抛弃了所有的传统,整个社会思想的中心价值观念也不再有支配性,偶像失去了光环,权威失去了威严,在市场经济中解放了的“众神”迎来了狂欢的时代。而“现代文化形态”并没有伴随现代化的步伐同期而至。就连欢呼这个“众声喧哗”时代到来的评论家,也不得不以无奈的语调发出“无法整合的现实”的慨叹。

但是,90年代的文化冲突,并非始于这一年代,在它的初始时期,思想文化领域曾一度出现空白,知识分子在这一时代大都表示了沉默,知识分子独步的领域由于主角的退场而如沉寂的荒原。这时,鲜有政治色彩的、集中突出娱乐功能的文化乘虚而入。谁也不会想到,大众文化是在这样的时机以出其不意的方式迅速而全面地占领了文化市场,琼瑶、三毛、席慕容、汪国真、《渴望》以及后来陆续重新翻印的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等现代闲适小品风行一时。这些柔性文化以舒缓、轻松、温情、性爱等方式,在当代中国第一次以没有受阻的命运畅行于市场,受众也第一次被如此不可抗拒的温情所抚慰。同时,谁也没有想到,这不作宣告的、不动声色的出场仅仅是90年代覆盖性的市场文化的开幕式。在不具备市场文化生产条件的90年代初期,是港台地区文学和历史作品充当了先期替代物,而当中国的市场文化获得了生产能力后,便如洪水泄闸,以排山倒海的气势不断更新换代,成为时代文化主流。因此,在90年代的文化冲突中,市场文化以被动的方式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这是因为,由于功能和目标的规约,市场文化并不主动攻讦其他文化,并不以斗争的姿态出现,甚至连它的面孔也是妩媚和温和的。

市场文化在90年代初期大规模占领了文化空间,这一现象本身隐含着它长期受到抑制的事实。激进的革命理想和一体化的精神处境,不可能为市场文化的生长提供空间。那“大众化”的文化策略,本身就隐含着鲜明的意识形态语义,在通俗易懂的表达策略中,有明确的教化内容。因此,那并不是今天意义上的市场文化,它是政治文

化的一种“转译”形式,就这个意义而言,那消费性的、充满娱性意味的市场文化恰恰构成了它的对立面。“大众化”策略本身具有两种功能,一是它替代或填补了民众对文化娱乐性功能的要求;二是它浅显易懂,在不经意的娱乐中又完成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教化要求,“寓教于乐”,正形象地说明了“大众化”文化的功能目标。它不是一次性消费的文化复制品。在长期的实践中,它形成了自己的经典系列,并成为不同时期重复的思想文化资源,在需要的时候,它将被反复利用,并由于阐发而增添新的意义。1996年,再次席卷中国文坛的“红色经典”旋风,便又一次印证了上述看法。

但供市场消费的市场文化多为一次性,它以新奇、刺激、欲望作为主要特征。它的生产方式也与“大众化”的文化作品极不相同。后者主要依据主流意识形态的教化要求,它有明确的“计划性”。所谓“国产重点影片”的提法,便是其中之一,而“五个一工程”更体现了这一计划性的规模。前者主要依据市场的需求,它投民众之所好,其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取商业利润。因此,也可以说,今天谈论的市场文化,完全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它曾受到抑制,没有生长的可能和空间,除了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抵制和排斥外,也与计划经济的体制密切相关。

由此可以判断,在90年代的文化冲突中,市场文化以被动的方式成了矛盾的主要方面。它不可避免地遭到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警觉和精英知识分子的批判,这种有趣的文化冲突,在80年代以前是不曾有过的。一般说来,知识分子特别愿意标榜自己的独立性或独立精神,愿意与社会保持必要的距离而不是紧随其后。如果说他们也有强烈的介入欲望的话,那他们的介入也是以自己的方式,而不是以直接投身的方式。但在20世纪下半叶的大半时间里,由于具体精神处境的变化,知识分子独立的精神空间日趋陷落,同主流意识形态保持一致已成为他们不自觉的支配意识。另一方面,启蒙的精神传统和身份上的优越,也是他们存在的一个重要背景。于是,社会历史进程飞速发展的步伐,突然中断了他们与历史的联系,精神处境大大改

变了。而知识分子——特别是人文学科的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守恒力量,他们的变化是缓慢的,他们无法适应喧嚣的市场大潮所造就的另一个世界。他们的陌生、惊讶和隔膜,逐渐演变成了愤怒和批判,而他们指向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发育并不成熟的市场文化,他们对这一文化形态的幻觉性、欺诈性、平面性和消费特征,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揭示。但令人沮丧的是,这一市场文化对精英知识分子的拒斥与批判置若罔闻,它在不置一词中依然我行我素。无处不在的大众文化从民间萌发,一直体面地走上了国家的权威传媒,它在不同程度上宣告了这一冲突的结果。

市场经济从开始那一天起,就预示了传统人文知识分子必然面临的窘迫。80年代,市场经济在讨论中步履蹒跚,它的发展和走向常常处于情况不明之中。90年代,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发表使社会经济运作机制的大转变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人文知识分子不可能走上经济的主战场,他们被宿命般地排斥在市场经济之外,而传统的人文理想在这一时代失去了往日的神性光彩。于是,一种强烈的失落情绪浓云般地笼罩在这个群体的心头,短时间里,他们几乎集体上演了一场“天鹅之死”。最典型的就是贾平凹的《废都》在1993年的出版。作品以强烈的失落情绪传达了人文知识分子无法获得自我确证的悲凉感和文化失败感,而只能在喧嚣的都市中随波逐流,并以极端的方式投身于世俗生活中。主人公庄之蝶的心态和命运,在某些方面成为部分知识分子的精神缩影。

当然,知识分子的幻灭感,不只来源于对生存处境和精神处境的焦虑,也不只来自他们优越身份丧失后的失落。另一方面,它也来自知识分子自身的深刻危机,这一危机的具体体现就是流行于学界的“失语”一词的大量出现。而事实上,所谓失语,并不是知识分子真的丧失了他们学术表达的话语能力,重要的是,他们丧失了对自己生存方式和价值的自我解释能力。过去,他们是社会良知的守护人,是社会价值的权威阐释者,起码在精神层面,他们的优越性是无人可比的。因此,知识分子才对从政与经商大有不屑之势。而世风的转变

使知识分子的这一优越感威风扫地,他们那毫无实用价值的、坐而论道的人生方式,迅即被民众和社会所忽略。他们的优越感失去了赖以存在的基础,而他们在社会中的实际地位,也使民众对他们不再怀有敬意。对知识分子的肯定,仅仅限于教师或与他们相关的报道中。

同时,自 80 年代以来,在现代性的激进追求中,一种不作宣告的“西方中心论”在学界大行其道,西方所有的理论、方法和概念,走马灯似的在中国演练了一遍。从以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为肇始的所谓“新方法论”,一直到所谓的“第三世界文化理论”“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等,都是以最新潮和先锋的面孔,企图在思想文化领域获得“文化霸权”的地位。杰姆逊、德里达、福柯、拉康等成为最新的文化英雄和导师。操练者不顾理论原生的背景和具体的文化目标,只是一味地以实用主义的文化态度将其东方化,大肆渲染并用于具体的中国文化批评。多年过去之后,这一文化策略越来越显示出它的有限性和无力感,它们的解释力也越来越流于苍白,从而失去了有效性和听众。1995 年之后,这些来自西方理论的声音日渐稀薄,其实践者也在尴尬的境地中颓然退场。这一危机可能更为深刻,它表明的是,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思想文化界内部资源的极度匮乏;同时亦表明,单纯地追逐西方理论话语,不可能解决中国的文化问题。因此,对西方话语的崇拜者和信奉者来说,这一挫折同样使他们深怀失败感和失望情绪。这一状况,西方政治学家亨廷顿在 80 年代就预言过,他指出:“随着西方殖民统治变成历史的陈迹,随着精英分子越来越多地产生于本民族的文化,而不是产生于巴黎、伦敦或纽约,随着非西方社会中从来不曾与西方文化有多少接触的人民大众在政治上的作用日益重大,随着主要西方强国的全球性影响继续相对减弱,本土文化对于决定这些社会的发展进程自然就更重要了。现代化与西方的搭档关系已被打破。第三世界在继续推进现代化的同时,也有一部分深深卷入并致力于一个非西方化的进程。”^⑦这一论述,同样打破了对西方理论过度迷恋的幻觉。

显然,我们遇到了新麻烦。也就是说,一方面我们出于民族尊严